

## 回應蕭育和：再論文明性政治的悖論與死亡欲力的重新理解

### Response to Hsiao Yu-He: Revisiting the Paradox of the Politics of Civility and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eath Drive

劉紀蕙\*

Joyce Chi-Hui LIU

我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和蕭育和繼續討論關於「暴力」以及「文明性」(civility) 悖論的問題。蕭育和的文章(以下簡稱蕭文)觸及了政治與暴力之間的核心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蕭文的主要論述軸線,首先在於區辨「暴力的過度」與「暴力的殘餘」之差異。「暴力的過度」時常發生於法的例外狀態,尤其是無法轉化、無從辯證的常態化例外性暴力。此處,殘酷的暴力會赤裸裸地發生,也暴露了其「界限」。蕭文進而指出,巴禮巴所討論的「歷史之質料的符號化……一個質料的殘餘(residue),何以現在這個殘餘主要以殘酷的形式出現」(Balibar 2002: 137),是更必須重視的問題。蕭文認為,根據巴禮巴的說法,只有在「一個個特定的殘酷與極端暴力情境中,一個個無權利者對於擁有一切權利以及徹底的平等與民主的悖論式權利主張,從而出現一起起……主觀性過程」,也同時起自針對「公共秩序的客觀性體制的騷動」(insurgency) (Balibar 2015: 144)。蕭文指出,這個「瞬間翻轉」是一個「增補性的翻轉」(supplementary twist) (Balibar 2002: 138),是巴禮巴所謂的民主的「起義性要素」(Balibar 2004: 119),也正說明了巴禮巴所謂的「負向普遍性」的政治行動。負向普遍性的政治行動,不在於收束暴力政治,而在於反建制,同時也會是反暴力的。蕭文強調,只有對「暴力之過度」與「暴力之殘餘」的暴力批判論述,細究此一過渡中不同概念層次上論述的暴力,才能「透澈其『負面』政治行動論述的

\* 劉紀蕙,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兼主任。聯絡方式:joyceliu@nycu.edu.tw。

基進意涵」。

蕭文的核心關注，我是完全同意的。在長期閱讀巴禮巴的著作，我們都必然受到其深刻思想的啟發，也必會繼續從我們自身的處境出發，進一步探討暴力批判以及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雖然我的文章已經相當完整地展開了我的論點。不過，我認為蕭文透露了仍舊值得繼續釐清的三點問題。我願意在此稍作回應，使這些問題能有更清晰的梳理。

## 一、「文明性政治」(politics of civility) 的悖論

蕭文認為「文明性政治」或是「文明性策略」就是公民化過程的「負向運動」。我想，這是我對蕭文最為根本的不同意之處。

巴禮巴長期的思考，持續針對「政治」內在曖昧並存的性質進行探究。無論是解放性政治、轉化性政治，或是文明性政治，都不是暴力的反面；政治是調節與排除暴力的操作，但這三種政治概念都必然也包含了暴力的性質。

這三種政治概念中，「文明性政治」創造出一個空間，避免極端衝突發生，是巴禮巴所說的二度政治，「政治的政治」(politics of politics) (Balibar 2004: 115-116)。文明性政治的策略，無論是以倫理作為訴求的霸權策略，或是強調自我解放的多數派策略，又或是強調弱勢團體的少數派策略，都具有其悖論的面向。暴力可以是文明的，也可能是野蠻的。「文明性政治」無法脫離其內含的暴力性質；最為文明化的作為，也可能正是最為野蠻的作為。巴禮巴正是要思考：什麼時候人們會完全喪失抵抗的能力，接受宰制，服從象徵暴力，成為自願的奴役狀態？甚至，這些共同體的情感如何以自我合理化的偽裝說詞進行種族滅絕的行動，導致內戰或是侵略戰爭接二連三的發生，而龐大的遷移人口被迫陷入滅絕之境。

我所關心的問題則是，透過禮儀教化，建立身分認同，以法律、教育、公德、公民性等規範與德行所實踐的「文明性政治」，如何在建立正常狀態以及維穩操作之下，以被合理化與合法化的高度，施展其日常的暴力與壓迫？其後續的效果如何鋪墊了根深蒂固的國族認同情感？以及，法意識形態又如何保障

了具有排他性的公民權以及仇外心態？

我舉出的例子包括：台灣遠洋漁業的外籍漁工遭受奴隸對待的處境，遠洋漁業代理商提供權宜船旗的販售服務，跨國仲介集團實際參與的人口販賣，經濟特區提供的各種例外條款。這些例外狀態都是在台灣合法的條文之下所容許的公民經濟活動，以及法律視角之下的盲域。在自由市場競爭之下，每一個自由置產、投資、累積資本的公民，其自我保存的本能被刺激而發展為無限累積資本的擴張衝動。不同法律穿越而相互不碰觸的法律中空之地，卻製造了無數的非法空間：我將此稱為「公民政治穩定製造的負面空間」。

## 二、「負向運動」的拓撲概念

「負面空間」是被文明性政治所穩定製造的隱形空間，使得「暴力的過度」在文明性政治的延展之下，隨處出現。每一個守法公民，都可能會在法律賦予的公民權與法意識形態之下，執行對於他者的奴役與攻擊的主權行動。

這種暴力，是將個人的攻擊性以「行動化」（acting out）的方式展現；可能發生在遠洋漁船上、工廠工人的宿舍內、高山農場裡，也可能出現在家戶親密關係中對待外籍看護的言談行爲之中，毫無遮掩。

巴禮巴以拉岡的莫比烏斯環（la bande de Möbius），說明殘酷的異形同構的性質，也就是我所說的「文明性政治」與「暴力政治」的「一體兩面」。巴禮巴以視覺化的方式，說明從一個形式到另外一個形式的連續現象，彼此之間形態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但是，就結構而言，卻都是同一的（Balibar 2015: 73）。（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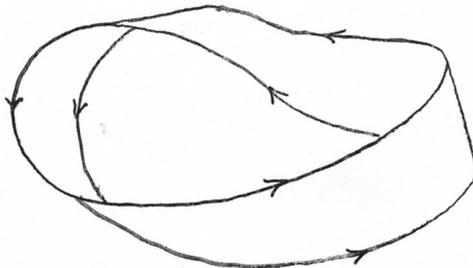


DIAGRAM 1. Lacan's original Möbius strip.

圖 1 圖片來源：Balibar 2015: 73

換句話說，從一種暴力形式到另外一種暴力形式的持續過程，例如文明性政治所教導的禮儀與公民身分，轉換為種族主義式的剝削與撻伐外地人的作為，二者之間沒有直接關聯，卻已經是正負兩面相互牽動的「無關係」之關係。巴禮巴說，另外一個如同「馬蹄鐵」形狀的示意圖，可以讓我們以視覺化的方式，理解到早已存在的結構所造成之效果：這個運動推到極限，便會造成的極端暴力（Balibar 2015: 75）（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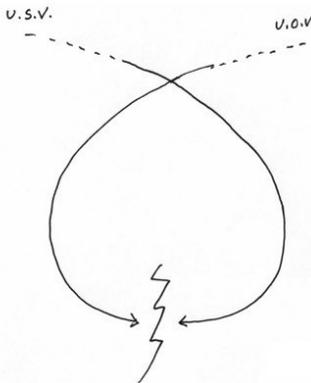


DIAGRAM 3. Politics as interruption in the continuity of ultrasubjective and ultraobjective violence.

圖 2 圖片來源：Balibar 2015: 75

除非，我們可以啟動「負向運動」，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時刻，依著交會的人事物啟動各種思想的反向運動，也就是巴禮巴所持續建議的「公民化運動」。

如同我在文章中所說，若要朝向「公民化的過程」，首先便必須面對其內在的障礙，辨識其不可見而持續發生效應的邊界線，以及維繫這些邊界線的法律與體制的僵化與頑固性，進行邊界內外的雙向翻譯，對法律進行質疑與挑戰，並與其脫鉤，進行重構。

### 三、關於佛洛伊德「死亡欲力」的理解

蕭文指出：「佛洛伊德『生物體要以自己的方式而死』一語，可說是對於上述極端暴力所帶來之無能為力境況的呼喊：我將不待爾等支配而死，『即便實際上於戰爭中暴死，被強制而生...的我們都不能真的『所有』（own）生與死』

(Balibar 2022: 136)」。蕭文結束於「反思並重拾『死亡』意義」，並「直面殘酷的『暴力之殘餘』」，到底思考了什麼樣「基進政治實踐」的可能性呢？

蕭文似乎透露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吶喊，甚至帶有悲劇心態的抉擇。我反而認為，我們必須認清佛洛伊德所反覆提出的「死亡欲力」，並不是求死的悲劇心態，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死亡」的決心，更不是無能為力境況的呼喊。

佛洛伊德所解釋的「死亡欲力」，也正是德希達以及巴禮巴所強調的，是重複的創造力。死亡欲力不同於渴望連結而成爲「同一」的愛的欲力；相反的，死亡欲力是解除鏈結，重新開始打開生命空間的能力。巴禮巴重新思考佛洛伊德的死亡欲力，便是要提出這個能夠阻撓生命暴力的古老死亡欲力：解除認同宿命的鏈結，以昇華的方式，透過藝術與遊戲，打開封閉系統，重新創造對象，建立關係，拓展一個轉圓的空間。正是在此處，巴禮巴所說的「公民化過程」，才可能維持永恆運動的方式，不斷使「負向」普世性成爲可能。

不同形式的邊界政治，顯示出我們缺乏對於國家與公民的新想像。巴禮巴認為我們需要不斷挑戰體制與法律，將邊界去神聖化與民主化，爲公共領域提供新的法律，並且構想出新的國家概念以及新的公民概念。除非我們可以「徹底地重構」人民與主權以及公民與社群的關係，也就是創造出一個「關於國家的新觀念」，不然我們就難以克服這些難題。根據巴禮巴的說法，這些象徵性的實體需要透過「體制性的創造」。

我也認為，這種「負向運動」必須不斷被重新啓動，從不同角落之「餘」持續發生，挑戰「名」與「法」背後體制的非必然性，重新思考「公共空間」，而沒有一次性解決的行動。

## 引用書目

Balibar, Étienne, 2002.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2004.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Princeton: Princeton UP.

———. 2015. *Violence and Civility: On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22. “Dying one's own death: Freud with Rilke,” *Angelaki* 27(1): 128-139.